

高职教育促进社会流动情况分析

——基于 H 市高职院校的调研

何杨勇 祝巧

摘要 高职教育作为促进社会流动的制度化通道,其效能实现亟需破解结构性矛盾。调研发现,H市高职学生因父母职业阶层、文化程度以及家庭人均收入的不同,子女接受高职教育机会会有明显差异。H市高职院校为社会中下阶层的子女提供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学生选择高职教育和专升本的主要动机是就业,H市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率相对较高,社会阶层有所跃迁,但薪酬较低,就业主要以省会城市为主,存在择业焦虑。为此,要提高高职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提升高职教育层次和地位,增加高职教育经费投入,倡导公平的制度文化等,助力高职教育促进社会流动。

关键词 高职教育;社会流动;社会阶层;就业质量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5)12-0074-07

一、问题提出

索罗金(Sorokin, P. A)认为社会流动指的是个人或群体从一个社会地位或阶层转移到另一个社会地位或阶层的过程。这种转移可以是垂直的,即地位上升(向上流动)或下降(向下流动),也可以是水平的,即在同一社会层级内的不同职位之间的转移^[1],本文的社会流动是指垂直流动。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一直是教育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从已有文献来看,职业教育是否能够促进社会流动,学界观点尚不一致,主要有两派:教育促进社会流动和教育阻碍社会流动。

国内外学者认为,职业教育能够促进社会流动。波利顿(Pollitt, K)等讨论了职业培训如何适应未来的挑战,间接支持了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

性^[2];韦伯(Webb, S)等分析认为,在德国职业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发挥比较好,在英美国家高职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较难发挥^[3];魏格纳(Wiegand, A)和迈瑞(Mairé, R)认为,高等职业教育能够提升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有助于提升社会流动性和减少社会不公平^[4]。

针对国内的实际情况,谢作栩、王伟宜在研究整个高等教育时认为,在公办高职院校中,拥有不同家庭文化资源的子女间的入学机会差异程度相对于其他类型高校来讲最小,说明高职教育对于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平等有积极作用^{[5][6]};冉云芳、陈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浙江省高职教育对毕业生就业质量若干方面有着积极的显著影响^[7];潘峰认为,高职院校已成为“农二代”进入城市、获取高等教育资源、谋求未来工作的重要驿站^[8];

作者简介

何杨勇(1977-),男,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职教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职业教育(杭州,310018);祝巧(1989-),女,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

2022年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项目“高职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现状和机理研究:基于在杭高职的实证分析”(Z22JC053),主持人:何杨勇

瞿连贵、李耀莲认为,职业教育促进社会流动,主要体现在思想变化、空间流动、职业流动、收入流动和发展方向流动等方面^[9]。

也有学者认为,教育是工人阶级的再生产,一定程度上起着阶级固化的作用。鲍尔斯和金蒂斯、布迪厄等人指出,教育是统治阶级实现阶级复制的重要工具,教育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巴氏梅克(Bathmaker, A. M)、惠拉汉(Whirhall, M)、尼伦德(Nylund, M)和罗斯瓦尔(Rosvall, M)、维罗莱宁(Virkkunen, J)和森可韦斯特(Sinkkonen, J)认为,职业教育培训课程是工人阶级再生产的体现和工具^{[10][11][12][13]};卢卡斯(Lucas, S. R)提出了“有效维持不平等”的EMI假设,即如果数量差异是教育层次的普遍差异,那么社会经济地位上层阶层必将获得数量优势,如果质量差异是教育类型的普遍差异,那么社会经济地位上层阶层必将获得质量优势。这意味着高等教育的分化,将不利于社会流动^[14]。

以上研究共同展示了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复杂作用,并强调了高职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性方面的潜在价值。合理、公平、畅通、有序的社会流动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推动力。本文关注高职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相关问题,从三方面开展研究:第一,把高职教育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第二,重视差异化,考虑到社会变迁、政策因素和地区差异,大规模调研H市高职院校,验证高职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和方式;第三,分析高职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机理,提出促进社会流动的对策。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聚焦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省会城市H市,该市作为区域教育中心,拥有19所高职院校(公办16所/民办3所),2023年在校生规模达17万人,其中11所公办院校入选教育部首轮“双高计划”,教育质量全国领先。高职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重要通道,其功能需结合区域发展特征深入探讨。本研究构建“生源结构—学习影响—就业质量”三重分析框架,旨在揭示高职教育对中下阶层学生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为优化教育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研究通过解析H市高职院校生源结构特征,探究其是否为社会中下阶层学生提供高等教育机会;挖掘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揭示学习背景与学习状态的关联机制;描述高职教育对学生就业质量及阶层跃迁的实际效用,验证其社会流动功能。

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定量与定性结合),分两阶段实施。一是定量研究:采用抽样调研方法,随机整群抽样,覆盖不同院校类型(公办/民办)、年级和专业,设计结构化问卷,涵盖生源背景、学习经历、就业状况等模块,确保样本反映H市高职生阶层分布特征,运用SPSS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二是定性研究:基于问卷数据,采用随机分层抽样选取典型个案(覆盖不同家庭背景、学业表现及就业结果群体),聚焦学习动机、经济负担、职业发展等主题,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结合定量结果进行三角验证,增强解释效度。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不同生源接受高职教育的总体差异

课题组对H市19所高职院校2021-2023级学生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研,调研主要涉及生源背景和学习状况两个部分。共发放问卷150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252份,有效回收率达到83.46%。调研对象中,男生443名,占35.38%;女生809名,占64.62%。东部地区学生972名,占77.64%;中部地区学生189名,占15.10%;西部地区学生91名,占7.26%。直辖市/省会城市学生200名,占15.97%;地级市学生189名,占15.10%;县级市学生389名,占31.07%;乡镇农村学生474名,占37.86%。

1.学生生源地差异分析

调研发现,H市高职院校来自直辖市/省会城市的学生占15.97%,来自地级市的学生占15.1%,来自县级市的学生占31.07%,来自乡村的学生占37.86%。2021年全国人才调研的数据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36.11%^[15]。2023年末H市所在省的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城镇化率)为74.2%,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5.8%^[16]。H市高职学生的生源中,乡村学生的比例与全国基本持平,乡村生源是H市所在省乡村人口平均比例的1.47倍。这说明,高职院校是乡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渠道,对于高等教育在乡村的普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不同阶层辈出率分析

辈出率是衡量不同社会阶层子女获取特定教育机会(如高等教育)差异的量化指标,通常以某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中的占比与其在社会总人口中的占比之比表示。陆学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将当前我国社会职业结构划分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

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17]。各阶层子女所拥有的高职教育入学机会差异显著,高职学生主要阶层为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其中个体工商户的辈出率为4.25,产业工人的辈出率为1.2,农业劳动者的辈出率为0.41。这一结果显示,社会中下阶层进入高职院校学习的比例较高,高职院校为社会中下阶层子女入学提供了机会。

3.生源的职普结构分析

高职院校的生源类型中,来自重点高中的学生占8.3%,来自普通高中的学生占42.54%,来自中职学校的学生占49.16%。当前中职毕业生升学比例上升,绝大部分中职生升学进入高职院校学习。调研对象中,招生形式为统一高考的学生占36.63%,单独考试的学生占31.36%,提前招生的学生占18.36%,三位一体招生的学生占1.28%,中高职一体化招生的学生占12.37%。这说明统一高考和单独考试是目前高职招生的重要渠道。通过访谈,学生们普遍认为统一高考和单独考试相对于其他招生形式更加公平。

4.父母文化程度分析

文化资源具有极强代际传递性,家庭文化程度越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越多。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文化程度分类,以父母平均文化程度代表家庭文化程度,以父亲文化程度优先,分析H市高职院校高教入学机会辈出率的代际传递情况,见表1^[18]。H市所在Z省的《社会人员学历提升行动计划(2022-2025年)》显示,在20~59岁人口总体受教育比例分别是大学(大专及以上)占25%,高中(含中专)占17%,初中及以下占58%。从表1可知,H市高职院校学生家庭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下,占比46.72%,且辈出率在0.81,即他们的子女接受高职教育的机会略低于平均水平;相反,父母学历在高中以上的辈出率为1.05,略高于平均水平。一方面,这说明高职教育在为父母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子女提供高等教育机会方面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这也说明高职教育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社会阶层固化作用。

表1 以家庭文化程度为基准的高职教育入学机会辈出率

文化程度	大学(大专及以上)	高中(含中专)	初中及以下
总体分布比例A(%)	25	17	58
学生家庭文化程度构成比例B(%)	26.2	27.08	46.72
辈出率B/A	1.05	1.59	0.81

5.家庭经济收入影响分析

为深入探寻家庭经济对高职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以家庭经济年收入代表家庭经济程度。目前,国家统计局尚未开展全面的家庭经济年收入调查,此次调研以抽样学生

家庭经济年收入比例来估测H市高职院校入学机会,见表2。H市高职院校就读的学生中,家庭年收入在4万元以下的学生占比为33.07%;4万~10万元之间的学生占比为28.83%;10万~20万元之间的学生占比达到25.96%。根据H市所在Z省统计局调研(H市的高职院校生源以Z省为主,因此以Z省的家庭居民收入作为对照),2023年Z省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主要指标(2023年1季度)是20158元,其中城镇居民收入是23589元,农村常住居民是13198元^[19]。按照一家三口、一年四季测算,2023年Z省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241896元,其中城镇居民收入是283068元,农村常住居民是158376元。按此比例,调研对象中只有152名学生,占比12.14%的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元。其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家庭占61.9%。这说明,就读高职院校学生家庭经济收入普遍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高职教育为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提供了重要的教育路径和发展机遇。

表2 以家庭年收入为基准的高职教育入学机会比例分布

家庭经济年收入(万元)	20以上	10~20	4~10	4以下
所抽样学生家庭年收入比例(%)	12.14	25.96	28.83	33.07

(二)高职学生学习影响的分析

在对19个高职院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结合随机抽样访谈,从学习动机、专升本考试、学习背景、学习经济负担和产教融合等维度,对高职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学生学习动机分析

关于读高职的目的选项,学生回答的选项频次如下:就业占68.44%,专升本占65.78%,丰富人生经历占55.6%,提升社会地位占33.63%,个人兴趣爱好占28.76%,满足父母愿望占15.93%,其他占16.67%。关于促进努力学习的因素的选项频次如下:个人兴趣占83.97%,专业就业形势好占65.49%,教师指导有方占49.85%,家庭影响占60.77%,学校管理占41.30%,其他占18.88%。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高职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就业,但通过高职教育专升本,已经成为不少学生就读高职的重要原因;二是在读高职的目的中,个人的兴趣爱好频次排位比较靠后;三是在促进努力学习的因素的选项中,前三位分别是个人兴趣、专业就业形势和家庭影响。相反,教师指导和学校管理频次较低,一方面说明教师指导和学校管理未能发挥功能;另一方面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就业和家庭影响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比学校教育更大。

2.专升本考试的影响

高职学生专升本是指高职高专往届和应届毕业生参加

选拔性考试,考试通过后进入普通本科高校学习的过程。调研发现,关于读高职的目的选项中选择就业的频次为68.44%,选择专升本频次为65.78%,至少有34.22%的学生既选择了就业,也选择了专升本。在“是否有意愿参加专升本考试”的选项中,有51.03%的学生选择了“有,并准备”,有38.2%的学生选择了“有,未准备”,总计有89.23%的学生选择了有意愿参加专升本考试。调研发现,某高职院校2023届毕业生中,有高达34.61%的高职学生选择继续深造并成功进入普通本科院校学习。当前,Z省的专升本考试主要科目是大学语文、高等数学和英语。这些科目与学生的专业课学习联系不多,并且专升本的考试时间和学生企业的实习时间存在冲突。如果说高职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是两种不同的类型,通过专升本考试的学生需要实现从职教类型向普通教育类型的转变,高职教育不但没有成为学生公平发展的助力,可能还会成为学生公平发展的障碍。

3. 学生教育背景对学习的影响

教育背景对学习成效会有一定影响,生源类型与学习适应性之间呈现显著关联。调查数据显示,在生源构成方面,中职背景学生群体中认为先前教育对当前学习产生显著正面影响的占63.22%,认为正面影响有限的占29.20%,而感受到负面影响和选择不确定的分别占4.13%和3.45%。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普通高中背景学生群体对先前教育影响的积极评价更为突出:77.88%的普高生认为高中阶段学习对其当前学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比中职生群体高出14.66个百分点,同时其负面影响感知度(5.73%)和不确定性(2.53%)也均低于中职生群体。在“家庭支持对当前学习影响的选项”中,选择正面影响较大的占67.85%,正面影响不大的占15.83%,没有影响的占15.04%,有负面影响的占1.18%,总体来说,家庭支持对学生学习起着较大的正面影响。在生源地与学习生活适应的选项中,来自农村的学生中,选择平等融洽的占76.69%,选择需要适应过程的占20.51%,选择感受到一定歧视的占2.53%;来自城市的学生中,选择平等融洽的占80.21%,选择需要适应过程的占16.60%,选择感受到一定歧视的占3.18%。这说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学生,都有少部分学生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在建立平等融洽的同学关系上,对于农村的孩子更需要积极引导。

4. 学生的经济负担

调研发现,高职学生月生活费1000~2000元的占69.62%,2000~3000元的占28.32%,3000~4000元的占1.47%,4000元以上的占0.59%。大部分学生月生活费在2000元左右,总体属于比较节俭的类型。在上学是否给家庭带来

负担的选项中,选择没有负担的学生占30.24%,选择有负担但不大的学生占55.46%,选择有较大负担的学生占12.98%,选择负担非常大的学生占1.33%。这表明尽管学生生活比较节俭,但总体上学生就学还是给家里带来了一定的负担。

5. 产教融合的影响分析

产教融合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路径,但是学生在产教融合中处于弱势地位。调研发现,学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相关规定的选项中,清楚了解的学生占14.45%,比较了解的学生占33.92%,不怎么了解的学生占40.27%,不清楚的学生占11.36%。因此,高职院校在加强对学生产教融合的引导和教育方面具有紧迫性。

(三) 高职学生就业质量

课题组同时对H市高职院校2020~2023届毕业生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研主要围绕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73份,回收率为91%。在273份有效问卷中,男生92名,占33.7%;女生181名,占66.3%。学习成绩在后50%的学生44名,占16.12%,排名25%~50%的学生116名,占42.49%;成绩在前25%的学生113名,占41.39%。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学生158名,占57.88%;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学生115名,占42.12%。如何衡量就业质量,国内外学者有一些共识,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工作稳定性、工作待遇和工作环境、提升和发展机会、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度、意见表达和对话机制五个方面^[20]。经调研,H市高职学生就业质量主要呈现三方面特点。

1. 就业率较高,社会阶层有所跃升

根据H市高职院校的《2023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2023届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97%以上。从三产就业的情况来看,第一产业占1.47%,第二产业占28.91%,第三产业占69.62%。根据Z省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底,Z省就业人口总数3885万人,其中,第一产业203万人(占比5.2%),第二产业1726万人(占比44.42%),第三产业1956万人(占比50.34%)。高职毕业生就业领域比较符合国际上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缩减、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增加的趋势。从不同行业的工资分析来看,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属于工资最低的行业之一,约为全国平均工资的67.5%。高职学生在第一产业就业比例低于Z省的平均水平。在就业类型的选项中,选择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学生占14.65%,选经理人员的学生占5.49%,选私营企业主的学生占7.69%,选专业技术人员的学生占12.09%,选办事人员的学生占8.42%,选个体工商户的学生占12.82%,选商业服务业员工的学生占22.71%,选产业工人的学生占6.59%,选农业劳动者的学生4.4%,选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

业者的学生占5.13%。对照高职学生的父母阶层比例,可以发现,社会地位处于前列的阶层跃升比例较高,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比例是3.11,经理人员的比例是2.75,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是3.44。社会地位处于最后的三个阶层的比例较低,产业工人的比例是0.31,农业劳动者的比例是0.25,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的比例是1.05。这说明,高职教育在学生的阶层跃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能够使更多的毕业生由社会下层跃升到社会上层,处于社会底层的比例显著下降。

2.工作薪酬较低,就业以省会城市为主

尽管H市高职学生就业率高,但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毕业生初始就业月薪普遍在5000元以下,占比达到78.39%;月薪位于5000~7000元的毕业生,占比为13.19%。而在就业一年后,月薪低于5000元的毕业生比例下降到45.05%,较初次就业时下降33.34个百分点;月薪在5000~7000元的毕业生比例上升至30.04%,较初次就业时增长了16.85个百分点。这表明,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高职毕业生的月薪涨幅较为明显,就业质量得到一定提升。然而,根据2023年Z省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统计公报的数据,2023年Z省城镇非私营单位、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月工资为8310元^[21]。由此可见,高职院校毕业生薪酬普遍较低。从就业分布地域来看,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占77.29%,中西部等地区则占比极少。根据H市某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报,该校近五届毕业生浙江省内就业比例分别为96.32%、93.92%、91%、95.14%、95.08%,省内就业毕业生主要流向了H市(省会城市),分别为61.11%、57.83%、62.77%、58.54%、55.46%;而对生源地类型的调研中,来自省会城市的学生比例仅为15.96%,这说明高职教育对于学生地域的跃升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考虑到企业招聘的要求和H市的人才政策,高职学生在H市就业的比例有下降趋势。受访毕业生提到,省会城市的主要优势是城市的集群效应,生活质量、子女教育和医疗条件比较不错。但省会城市也存在着劣势:一方面,有的地区的人才政策对高职学生并不友好,绝大部分优惠政策只针对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才;另一方面,省会城市的房价和物价等生活成本偏高。

3.有效促进就业,学生择业存在焦虑

调查数据显示,对于高职教育对您就业有多大的作用的选型中,选择非常有用的学生占20.88%,选择比较有用的学生占26.01%,选择有作用的学生占32.6%,选择基本无作用的学生占20.52%。在综合考虑各项就业因素的情况下,毕业生在择业时最优先考虑的因素依次为:工作环境(64.1%)、薪酬待遇(61.54%)、工作稳定性(51.65%)、发

展机会(50.55%)、工作地点(43.59%)、个人兴趣(33.7%)、工作自由度(31.14%)、社会地位(30.04%)、良好的同事关系(25.64%)、专业对口性(25.51%)。可见,高职学生择业更看重的是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的相关指标,对于个人兴趣、社会地位等内在价值指标关注度明显弱化。这种梯度分布折射出高职毕业生群体迫于经济压力形成的“实用主义择业观”,其本质是高职毕业生作为社会资源弱势群体,存在着工作环境不舒适、薪酬待遇低和工作不稳定等方面的焦虑,他们的择业自由度受到一定限制。

四、结论与建议

(一) 相关结论

1.高职教育对促进社会流动有积极作用

本研究揭示高等职业教育在社会流动通道中呈现三重结构性优势:其一,作为乡村青年高等教育普及的关键路径,该教育体系有效弥补了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差异;其二,在社会阶层流动维度,职业院校显著改善了中下阶层的代际流动机会;其三,在教育补偿机制方面,职业教育系统通过多元录取模式(含统一高考与单独考试)构建了立体化入学通道,有效吸纳了中职毕业生群体、父母学历在高中以下家庭及家庭年收入5万元以下群体的高等教育需求,凸显其促进社会流动的社会调节器功能。

2.高职教育促进社会流动遭遇阻碍

诸如专升本考试的科目内容、就业市场的政策与制度性歧视,以及毕业生对工作环境不理想、薪酬待遇偏低和工作稳定性不足的担忧,都构成了高职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障碍。同时,高职毕业生城乡地区无业、失业及半失业人口比例的上升,进一步加剧了高职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性方面所面临的难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个体通过高职教育实现社会地位提升的可能性,也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3.高职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

学生就读高职院校主要是为了就业,但专升本已成为不少学生就读高职的重要原因;学生选择高职出自个人兴趣的比例不高;未来的就业前景和家庭的影响对学生来说,比学校教育更重要;专升本考试无论在学习时间上还是学习目标上,与就业存在冲突,对于高职学生存在着很大的不公平;普高生高中阶段的学习对高职阶段学习的正面影响更大,家庭支持对学生学习起着较大的正面影响;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学生,都有少部分学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在建立平等融洽的同学关系上,农村的学生比城市的学生更需要积极引

导; 高职学生的就学会带来一定的家庭经济负担; 在产教融合中, 学生在信息资源和专业能力等方面处于弱势, 高职院校需要加强对学生产教融合的引导和教育。

4. 高职毕业生就业的阶层跃迁与结构性挑战

高职教育在学生的阶层跃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能够使更多的毕业生由社会下层跃迁到社会上层, 处于社会底层的比例显著下降。但是, 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的比例有所增加, 这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高职教育对于学生生源地的跃升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省会城市的主要优势是城市集群效应明显, 生活质量高, 但人才政策对高职毕业生并不友好, 房价和物价等生活成本偏高; 高职毕业生对于工作存在着工作环境不舒适、薪酬待遇低和工作不稳定等方面的焦虑。

(二) 相关建议

1. 提高高职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高职教育为社会中低阶层和弱势群体提供了高等教育的机会。高职教育的质量,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弱势群体能否有效实现阶层和地域的跃迁流动。高职教育应当立足实际, 紧密围绕学生、企业和社会的需求, 坚持以促进就业为导向, 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 结合当地及行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状况, 合理设置专业或专业群, 增强岗位匹配度。产教融合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 要加大对学生产教融合引导力度, 为学生提供更贴近实际工作环境的学习机会, 增强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就业作为社会弱势阶层实现阶层跃迁的重要通道, 其效能直接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当弱势家庭子女通过三年乃至更长周期完成高职教育, 却遭遇结构性失业时, 不仅意味着前期投入的大量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沉没损耗, 更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固化, 甚至会衍生出冲击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

2. 提升高职教育层次和地位

目前, H市共有19所高等职业院校, 仍以专科层次为主。社会对高职毕业生学历存在一定的歧视, 高职学生升本意愿强烈, 试图通过专升本考试的形式, 在三年职业教育基础上再接受两年的学术教育, 以期提高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和

平等机会, 这对高职学生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为此, 应采取多元措施提升高职教育层次和地位。一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可局限于某一个固定的机构来开设, 探索以专业为单位, 由符合要求的高等教育机构来开设。二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途径多样, 既可以通过建立新机构来加以发展和推进, 也可以对原有机构进行衍生发展。具体来说,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既可以通过高职院校升本模式加以推进, 也可以由已有普通本科甚至研究型大学, 开设职业本科专业加以推进。三是坚持职业教育定位。职业本科与学术本科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面向企业实际需求。因此,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应坚持强化学生入学要有企业实习合同、校企密切合作、企业在课程设置中享有话语权。

3. 增加高职教育经费投入

鉴于高职教育在实验实训方面的支出通常高于普通本科教育, 因此在经费配置上应当给予充分重视, 确保在教育拨款、学生学费以及师资力量配备等方面逐步实现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均衡。鉴于高职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较为困难, 强化经济支持措施尤为关键。通过实施奖学金、地方政府和学校设立的专项基金及勤工俭学等多种形式的经济援助, 能有效缓解学生的经济压力,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让学生有更多精力投入到学习和个人成长中。

4. 倡导公平的制度文化

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中, 尽管高职教育在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在就业市场中, 高职毕业生仍然面临着不公平的待遇。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应当倡导并建立劳动平等、职业平等及薪酬平等的社会制度, 取消学历歧视, 让高职毕业生享有与本科生一样的就业待遇。政府、社会和企业需要共同努力, 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首先, 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 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学历歧视, 保障所有求职者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其次, 企业应当转变观念, 积极参与产教融合, 重视员工的实际能力和工作经验, 而非单一看重学历背景。最后, 社会各界应当加大对高职教育大有可为的宣传力度, 提高公众对高职教育的认可度, 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 [1]SOROKIN, P. A. Social mobility[M].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27: 23.
- [2]POLLITT, D. A flexible workforce for the modern economy: the role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J].Education & Training, 2001(7): 345-376.
- [3]Webb, S., et a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J].Journ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Learning, 2017(1): 147-167.
- [4]WIEGAND, A., MAIRÉ, R. The rol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romoting social inclus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ining

Research, 2016 (2) : 85-97.

[5]谢作栩, 王伟宜. 高职教育与高等教育机会平等[J]. 教育研究, 2006 (10) : 67-75.

[6]王伟宜. 家庭文化资源与高等教育机会平等[J]. 高等教育研究, 2010 (3) : 45-52.

[7]冉云芳, 陈静. 高职教育对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证分析[J]. 教育与职业, 2014 (12) : 23-28.

[8]潘峰. 高职“农二代”的文化资本与社会流动——来自厦门高职毕业生的案例考察[J]. 高等教育研究, 2018 (1) : 56-63.

[9]瞿连贵, 李耀莲. 职业教育如何促进社会流动——机理、向度、限度及其进路[J]. 职教通讯, 2021 (1) : 16-25.

[10]BATHMAKER, A.M. Higher education in further education[J]. Reserach in Post-Cmpulorsory Education, 2016 (1-2) : 20-32.

[11]WHIRHALL, M.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s a tool for social reproduction[J].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eview, 2015 (1) : 5-22.

[12]NYLUND, M., ROSVALL, M.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s a site of class reprodu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2016 (6) : 798-813.

[13]VIRKKUNEN, J., SINKKONEN, J.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s a mechanism for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7 (2) : 212-225.

[14]LUCAS, S. R.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 track mobility, 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1 (106) : 1642-1690.

[15]城镇人口占63.89%! 总人口141178万!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EB/OL]. (2021-05-11) [2025-02-28].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9NJ66PG05346KFL.html>.

[16]浙江省统计局. 区域人口[EB/OL]. (2024-02-26) [2025-01-28]. <http://tjj.zj.gov.cn/col/col1525491/index.html>.

[17]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13.

[18]人才红利时代开启: 我国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人口2.18亿人, 占比提高至15.5%[EB/OL]. (2021-05-11) [2025-02-28]. <http://news.sina.com.cn/o/2021-05-11/doc-ikmxzfm1764041.shtm>.

[19]国家统计局浙江省调查总队. 2023年一季度浙江居民收入平稳增长[EB/OL]. (2023-04-26) [2025-01-06] http://zjzd.stats.gov.cn/fxyj/202304/t20230426_108972.html.

[20]赖德胜. 高质量就业的逻辑[J]. 劳动经济研究, 2017 (6) : 6-9.

[21]历年浙江省职工年/月平均工资[EB/OL]. (2024-10-11) [2025-02-28]. <http://www.hzldzy.com/detail-532.html>.

Analysis on the Rol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Promoting Social Mobility

——A Survey Based 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H City

He Yangyong, Zhu Qiao

Abstract As an institutional pathway for promoting social mobility, the effectivenes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urgently requires addressing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Research findings reveal significant disparities in access to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mong students in City H based on their parents' occupational clas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household per capita income. Higher vo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City H provide increased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for children from lower-middle social strata. While employment remains the primary motivation for students choosing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ursuing bachelor's degree upgrades, and despite relatively high employment rates among City H's vocational college graduates leading to some upward social mobility, issues persist, including comparatively low salaries, employment concentration in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career selection anxiety. To enhanc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s role in facilitating social mobility, measures should include improving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standards, elevating its academic level and social status, increasing funding investment and fostering equitable institutional cultur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al mobility; social stratum; employment quality

Author He Yangyong, professor of Zhejia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angzhou 310018); Zhu Qiao, research assistant of Zhejia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Trade